



蒋光慈

# 蒋光慈:革命文学的“开路先锋”

□桥歌

大会,成为安徽著名的学运领袖。

为了寻求救国图强的真理和道路,蒋光慈于1920年8月只身前往上海,进入“外国语学社”学习,并结识了陈独秀等早期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后经陈独秀介绍,在上海加入中国首批社会主义青年团,接受了先进的社会主义思想。

1921年春天,蒋光慈被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选派,与刘少奇、任弼时等赴苏联莫斯科深造,被分配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学习。1922年12月7日,蒋光慈在莫斯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蒋光慈第一次将自己署名为蒋光赤,以显示其向往革命的决心。

莫斯科4年的学习,使他成为了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 以笔作枪,开创革命文学

1924年秋天,蒋光慈满怀救国之愿学成返回国,归国后听从党组织的安排,来到上海大夏社会系任教。当时,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虽然不复存在,但中国共产党仍处于幼年时期,特别是北京长辛店“二·七”大罢工的失败,使中华大地仍阴云密布,混乱不堪,中国人感到无所适从,民族的未来呈现出一片黯淡。蒋光慈深深感到,在中国,要想革命成功,必须唤醒沉睡的国民。要唤醒国民,最理想的方式就是开创革命文学,用革命的文学教育启迪下层人民。于是,蕴藏在蒋光慈身心内部的文学酵素发酵了,“莫斯科的旗帜,把我的血液染红了”。他下决心要做一个“革命的诗人,人类的歌童”,用自己的笔来狂歌革命。1924年底,他与沈泽民等同志发起成立了“春雷文学社”,用文学作品传播进步思想。

与此同时,他还挤出时间,抓紧创作当时工人农民等下层老百姓能看懂的进步文学作品。1925年1月,他第一部诗集《新梦》出版。时任左联常委、著名文学评论家钱杏邨对此评价道,此诗集是“中国的最先的一部革命的诗集”,“简直可以说是中国革命文学著作的开山鼻祖”。同年4月,他又奉调北京参加中共北方区执委会工作。1926年,中篇小说《少年飘泊者》问世,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最初成果和扛鼎之作。1927年11月,反映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中篇小说《短裤党》出版,又在民众中引起极大反响。1928年,他与孟超、钱杏邨等人成立革命文学团体“太阳社”,主编《太阳月刊》《时代文艺》《海风



周刊》《新流月报》《拓荒者》等进步文学刊物。

蒋光慈不仅致力于革命文学创作,而且还进行革命文学的理论探索,先后发表了《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现代中国文学界》等一系列富有远见卓识的理论文章,号召作家进行革命文学创作,推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向前进。他在文章中疾呼:“无产阶级革命,不但是解决面包问题,而且是为人类文明开一条新途径。”根据当时的形势,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建设无产阶级文学的初步主张:“谁能够将现实社会的缺点、罪恶、黑暗,痛痛快快地写出来,谁就能够高喊着人们来向这缺点、罪恶、黑暗斗争,则他就是革命的文学家,他的作品就是革命文学。”这些观点直面现实,深入浅出,无私无畏,且与党的中心任务紧密联系起来,因而十分引人注目。

为了创作更多的革命文学作品,蒋光慈可以说是夜以继日,呕心沥血。除了工作便是写作,无暇休息,更谈不上消遣,连父母多次来信催他回家一趟都未成行,甚至连同女友宋若瑜见第一面的功夫也抽不出来。在此之前,他们仅只是鸿雁传书、互递爱情。由于日以继夜的工作和写作,他积劳成疾,患上了严重的肺病,于1929年11月赴日治疗疗养。在日期间,他还在异国他乡主

持成立“太阳社东京支部”。病愈回国后,又与鲁迅、柔石、冯雪峰等人组成中国左翼联盟筹备小组。1930年3月,“左联”成立时蒋光慈被选为候补常务委员。同年11月,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咆哮了的土地》完稿,作品反映了1927年大革命前后农村中尖锐的阶级斗争,是作者最成熟的一部作品。他感到无限的欣慰,因而干劲更大。

在风雨摇摆、警探盯梢的恶劣环境中,蒋光慈一直过着清苦的生活,昼夜写作,即使肺病复发,也不听从瞿秋白、钱杏邨等人的劝告,不去医院治疗,致使病情越来越严重,身体虚弱不堪。他说他舍不得浪费宝贵的时间去医院。当时的中国文坛上,直接写革命者的作品很少,即使有,也是采用隐讳的笔法,老百姓不易理解。所以,他以朴实的文笔,努力写出更多的作品,唤醒广大工农群众,激发他们起来斗争。1931年4月,蒋光慈肺病加剧,于8月31日在上海同仁医院病逝。从此,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一位优秀儿女,中国文艺界失去了一位坚强的文化战士。1957年2月,安徽省民政部门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 传世之作,唤醒民众千千万

在蒋光慈众多的文学作品中,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少年飘泊者》可算是其代表作。它标志着当时蒋光慈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界引人瞩目的革命文学代表作家。小说主人公汪中是来自于安徽偏僻农村的一名青年,因父母被地主所害而成为一个孤儿,后来又当过土匪、乞丐、盗贼、学徒、流浪者、茶房、工人、囚犯,到处漂泊流浪,最后报考黄埔军校,在东征惠州战斗中牺牲。汪中不懈地追求幸福、反抗不幸的遭遇,对革命抱有坚定的希望和信心。他渴望自己做“一位不怕死的好汉”,有一定的革命气概。整部小说展现了五四运动前后到国共合作黄埔东征这一历史时期的社

会矛盾和斗争,反映了中国人民怎样的受着压迫,怎样的在压迫中感到痛苦,怎样的在痛苦中有了觉醒,有了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仇恨并自己站了起来。这部作品表现了当时中国青年由个人奋斗到参加集体斗争的全过程,反映了第一次大革命前夜,在中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思想和情绪。可以说是革命文学萌芽时代的一部实录。

《少年飘泊者》的正式出版,在当时黑暗的中国像一道闪电划破长空,引起了巨大反响。这部小说好就好在,适应了当时中国革命斗争形势的

要求,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现代社会的变革。在大革命高潮渐起时,尤其需要反映工人农民生活、反映革命人民英勇斗争的作品,以教育、鼓动、推进革命者再次投入新的革命斗争。据相关史料反映,当时众多有志之士都是因为读了该小说而走上革命道路的。特别是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7月出版的《习仲勋传》中,发现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同志多次回忆说,他之所以走上革命道路,就是受到当时著名革命作家蒋光慈的长篇小说《少年飘泊者》的影响。习仲勋读着读着,完全同书中主人公汪中的命运融在了一起,几乎是同喜、同怒、同悲、同乐。他觉得这正是自己真情实感的反映。眼前只有反抗,只有斗争才是正确的道路。他反复读完这部小说,坚定了他外出干革命的决心。”“后来,习仲勋曾多次对自己的孩子说过,当时认识到社会这么黑暗,旧的剥削制度要推翻,主要就是受《少年飘泊者》影响极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少年飘泊者》似一股清泉流向久渴的土地,滋润了那一颗颗奋进的种子,许多苦恼、忧郁、彷徨不定的青年在汪中形象鼓舞下,纷纷投身于滚滚的革命洪流之中。当时许多读者给蒋光慈写信,称他的这部作品似一盏路灯,在黑暗中摸索的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

《少年飘泊者》的正式出版极大促进了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进程,为革命文学的创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该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书信体小说,也是革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大批文学青年被它打动而矢志献身文学事业。正如文学评论家陈荒煤阅读后所言:“堕入无声的中国,真是说不出的迷茫和郁闷,蒋光慈的《少年飘泊者》使我当时感动得落下泪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陶铸看了小说后也不无感慨地说:“我就是怀揣着《少年飘泊者》去参加革命队伍的。”郭沫若读了《少年飘泊者》非常激动,称其为“革命文学的前茅”。

《少年飘泊者》的正式出版也使敌人闻之丧胆。当时的反动当局发现该书的内容和巨大作用后,立即下令各地严加查禁。正如太阳是遮不住的一样,该书越禁越多,从1926年1月初版到1933年5月,仅上海亚东图书馆印行就达16个版本。当然,特务的检查和跟踪,已给蒋光慈的革命文学创作带来了诸多麻烦和困难,以至于他在这一时期不断更换笔名,其中就有蒋光赤、光赤、侯生、宣恒、华维素等多个。可以说,反动当局的严加查禁,也为小说的广泛传播作了很好的宣传。

作为我党早期的共产党员,蒋光慈同志全身心地为党为人民写作,竭尽全力地为革命文学呐喊,为后世文化人树立了好榜样;《少年飘泊者》持续不断地传播,唤醒、打动和振奋了无数读者,使该书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成为中国新文学史上经典之作。

# 柔石《二月》:彷徨的张力

□马文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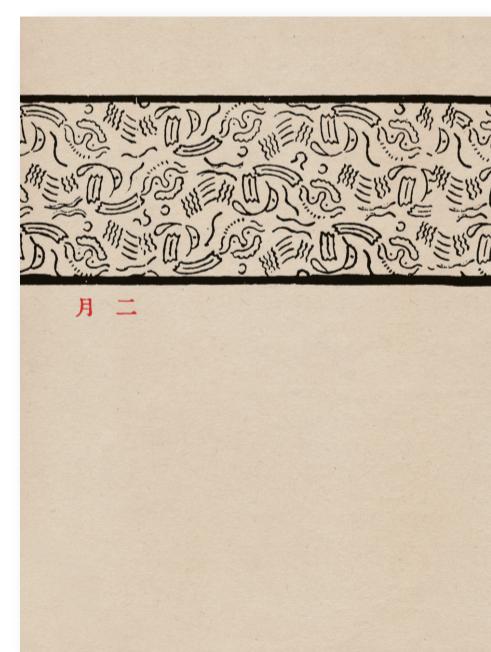
《二月》是柔石(1902—1931)的小说代表作之一,在中国文学史上颇有影响。自1929年出版以后,引发诸家评议,反响热烈,鲁迅也曾撰文推介,各界对《二月》的分析、研究与讨论一直持续至今。1960年代,小说《二月》被拍成电影《早春二月》,成为“十七年电影”的经典作品。1980年代,亦出版了多种连环画版“二月”,大大提高了小说的普及化与通俗化。进入新世纪以来,越剧《早春二月》、话剧《二月》等佳作频出,让观众感受到柔石作品的视觉与听觉双重魅力。本文即梳理近百年来《二月》诸般样态,考察其“彷徨的张力”,看《二月》是如何成为长盛不衰的经典的。

1926年早春,柔石离开北京,向南回到“绿色的海滨”——上海,想找“做事吃饭的地方”,暂住严苍山、汪静之、童中岳等同学家中,与王方仁和崔真吾一起创办学校而奔走于杭沪间。随后,柔石经王方仁介绍至镇海中学教课,后任教务主任。期间“三·一八”事件使柔石“心内的一腔愤懑,真恨的无处可以发泄”,于是“意识地野心地掇拾青年的苦闷与呼号,凑合青年的贫穷与忿恨”,遂作小说《旧时代之死》。

1927年柔石经宁波中学吴文钦邀请,以“开展宁地之文化”之想法,“返里服务”,担任宁波中学国文老师,兼授音乐与英文。随后发生的“四·一二”事件则让江南一片白色恐怖,柔石身陷入其中而周旋。

1929年,柔石经历了大革命的失败,环境迫使他在思想上让过去那种各行其是的自由主义色彩逐渐退却。这时的他将自己在浙江那段教师生活融入小说里,创作了《二月》,带有强烈的自传色彩:镇海县为芙蓉镇,宁波市即海市,普陀山是女佛山,镇海中学即芙蓉镇中学。

《二月》以1926年前后作为时代背景,通过书写青年知识分子萧润秋、陶岚等,以及在北伐战争中失去丈夫的寡妇文嫂及其一对子女的命运际遇,反映了大革命时期社会现实和知识分子对所处时代的思考,人物形象鲜明、语言富于诗意、篇幅精悍余味。虽然《二月》以恋爱为主题,但青年对时代的“彷徨”、对时局的“徘徊”,让柔石的笔墨坚定地站在贫苦无依的寡妇孤儿这一面。可以说,对革命者的尊重与对弱者的怜悯,构成了萧润秋的性格底色。小说里文嫂及其幼子的双亡,让萧润秋心灵上受到了打击;拯救弱小者和人道主义的寄托彻底被摧毁,他苦闷着、矛盾着,对未来更加彷徨,看不到路在哪里。另一方面,陶岚与萧润秋之间情感纠葛,组成了《二月》的中心情节,使读者有了青春美感之阅读体验。陶岚面对萧润秋娶文嫂为妻时,压着内心波澜,



只有一句“我觉得自己孤单”,恰似萧润秋说的“长阴的秋云里底飘落的黄叶的一个人”。

## 二

《二月》写就后,柔石送交鲁迅阅读。鲁迅很重视这部作品,对它有详细的口头批评,非常具体地指出优点,也指出缺点,柔石非常悦服这种诚恳而具体的批评。他说这种批评才是对作者有帮助的批评。鲁迅于8月20日撰文《柔石作〈二月〉小引》发表在《朝花夕拾》第一卷第十期。10月5日,鲁迅校毕《二月》。11月22日,《二月》由上海春潮书局出版。

陶元庆(1893—1929),字璇卿,浙江绍兴人。师从丰子恺和陈抱一等名家习西洋画,国画等亦有涉猎,为其从事书籍装帧艺术奠定了美学基础。鲁迅的《苦闷的象征》《彷徨》《故乡》等作品封面皆出自陶氏之手,与丰子恺、钱君陶并称为中国现代书籍装帧的三大家。1929年8月6日,陶元庆因病去世。故柔石《二月》封面成了陶氏遗作。《二月》的封面,陶元庆用上下两段横线,简练地概括了画面的空间,黑色线条勾勒出诸多人物的相貌,在类似河流中颠三倒四漂流着,满幅画面被紧张的情绪所包围,将“二月”主题表现得恰到好处,又耐人寻味。画面富装饰感而柔弱阴沉,虽属于西方的风格,但里面却涵容着一种东方的飘逸的气韵。

柔石拿到样书立即寄赠妹妹一册。12月3日,柔石又寄妹妹《三姊妹》小说一册,扉面上还

亲笔写着“前给你《二月》,你会懂吗?现在送你这一本,很浅的,你可看看。”

《二月》出版以后,佳评如潮。《春潮书局出版物所得的佳评》一文摘引鲁迅赞语:“我从作者用了巧妙的技术所写成的草稿上,看见了近代青年中这样的一种典型,周遭的人物,也都生动。”次年鲁迅将《二月》列为“优秀之作”之一再次予以肯定。鲁迅的《柔石小传》中总结“小说《旧时代之死》《三姊妹》《二月》《希望》”为柔石的“文学上的成绩”之一。柔石女友冯铿则说:“你把我的精神占领了去!坦白地告诉你:……自看你的《二月》以后,一种神秘的,温馨的情绪萦绕着我。差不多每一件事物,每一个时间空间我的心里总是充塞了这样不可救药的情绪,弄得自己简直莫明其妙,好像完全转换了另一个人!”

岁月悠悠,业已证明《二月》的艺术生命力。自《二月》1929年由春潮书局出版外,还有厦门大学油印版(年份不详)、1980年英文版、1982年德文版等,广为流传,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小说之一。

## 三

电影导演谢铁骊尤为偏爱五四时期的小说,他认为《二月》不是“才子佳人”的忧郁生活,而是讨论知识人面对革命,是顺流而进,还是急流勇退,这恰恰反映着革命的人道主义。但谢氏改编《二月》时,对柔石略显消极的结尾——萧润秋去了女佛山——做了修改,即让萧润秋奔向革命。

谢铁骊剧本《二月》于1962年2月16日完成,载1962年6月7日《电影创作》第三期。后来夏衍很重视这部电影,他认为原著小说中的“二

月”,实质上表达的是一种“春寒”。他又认为60年代的“二月”已无“春寒”之意。于是建议将片名改为“早春二月”,点出“早春二字比较醒目一些”,意即“春天快到了,但春寒还未尽”。此修改乃点睛之笔,叫“早春”而非“初春”,一字之差却云泥之别,再一次体现了文艺体裁的标题都是极重要的。



月”,实质上表达的是一种“春寒”。他又认为60年代的“二月”已无“春寒”之意。于是建议将片名改为“早春二月”,点出“早春二字比较醒目一些”,意即“春天快到了,但春寒还未尽”。此修改乃点睛之笔,叫“早春”而非“初春”,一字之差却云泥之别,再一次体现了文艺体裁的标题都是极重要的。

1962年,夏衍在北京电影厂召开关于《二月》的讨论会上说:柔石《二月》发表之时,由于当时的社会情况,原著及鲁迅的“小引”都很隐晦,比如小说中没有表现芙蓉镇的地下激流,因为当时这些东西不允许反映在作品中。但夏衍认为谢铁骊改编的时候,可以运用一些后景、道具以及通过人物的精神面貌,将当时的时代背景勾勒出来。夏衍是左翼电影运动的开拓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所以本身对柔石的《二月》应该也很喜欢的。夏衍对剧本的分镜头进行了细心修订,比如说,谢铁骊写的剧本里原有一处,场景为“荷花池,外,夜,春”,夏衍则在“春”的地方画了一个圈,并打上问号,旁边注明“春天不会有荷花”。夏衍的批改台本藏于北京电影制片厂,2000年为纪念夏衍诞辰100周年而影印出版,收入《夏衍手迹》。

1963年电影《早春二月》拍摄完成,可谓谢铁骊最成功的电影作品,也最可代表其艺术风格。因此片艺术上的重大突破,播映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983年被葡萄牙第十二届菲格拉达福兹国际电影节誉为“中国最美丽的电影”。1995年又被评为“中国电影90周年十大优秀影片”。

《早春二月》里“萧润秋极想有为,怀着热爱,而有所顾忌,过于矜持,终于连安住几年之处,也不可得。”同时,“他其实并不能成为一小齿轮,跟着大齿轮转动。”细观《早春二月》,其爱情色彩颇淡,更多描摹的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找寻与探求,以及任何时代青年都会有的彷徨、苦闷与迷惘。《早春二月》在当时充满了争议,但在后世却让我们恍然大悟,在“十七年”电影史上留下浓重的笔墨。这使柔石《二月》在非常年代里实现了经典的再生。

## 四

在20世纪中国的大众传播史上,连环画无疑是一个无法忽视的文化存在。自上世纪20年代在上海诞生,到80年代急遽退场,连环画以其“图画叙事”的媒介特质和建构其上的通俗文化形式,深深地嵌入20世纪中国的社会文化底版之中,成为国人共有的文化记忆。

据不完全统计,80年代前后,至少有四种与小说《二月》有关的连环画出版,发行量达180万册之多。比如1979年有电影连环画册《早春二月》(文飘改编,中国电影出版社1979年版),是根据同名影片改编而成。封面极有特点,是陶岚看萧润秋弹钢琴的画面,在中国还在“徘徊”的时期,描述青年人彷徨的电影用体现爱情画面作封面,足见中国改革之端倪。

1980年出版有连环画《早春二月》(姜文丽改编、邵殿英选片,辽宁美术出版社1980年版,印数530,000册),亦由电影改编而来。

1981年则有连环画《二月》(小戈改编,胡博综绘画,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年版),此册特点是将结尾改为“陶岚和哥哥去上海准备找萧润秋”,“河水总要流向大海,汇成那呼哨着的涛声……”连环画的题意所指非常明显。

1984年,王良莹改编、盛增祥绘画的连环画《二月》(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封面是萧润秋低头赶路的苦痛表情,封底则画着芙蓉镇的桥和风中的柳树,在内容提要里称“故事刻画了旧社会知识分子在摸索前进道路上的痛苦心情,揭露了旧社会的黑暗”,颇具时代特征。

反映年轻人“彷徨”的通俗连环画《二月》,其巨量发行、受众群体、风格特征、艺术成就等方面都可以清晰地反映出经典作品对社会文化传播产生的巨大影响力,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还没有哪种文化传播形式或载体可以达到如此普及的程度。

时代在更迭,青年人的“彷徨”却似乎成为一个亘古主题。2019年,话剧《二月》的导演李六乙接受《北京晚报》采访时说:“柔石笔下的芙蓉镇有太多值得思考的东西,其中的一些甚至比我们很多当代的作品更具思考价值,它关乎当下,无疑也关乎未来。”



1963年,谢铁骊根据《二月》改编的电影《早春二月》剧照